

謎樣人物高宗武(一)

●朱開來

胡適日記隱藏玄機

在抗戰前後，浙江樂清縣(溫州)有兩個風雲際會的年輕神秘人物，一位是張冲，一位是高宗武。張冲當時奉命聯俄聯共以抗日，高宗武則是與日謀和，他們兩人走着絕對相反的路線。

張冲在抗戰中期(民國三十年八月)病逝於重慶，年僅三十七歲。高宗武則於二十九年初，離滬赴港，脫離汪精衛陣營反正。不久，改名「其昌」，悄然赴美。這時，他大概是三十四歲左右。

關於張冲，我知之甚詳，曾爲他寫了一篇長文，在本誌二四九期連載。對於高宗武，雖聞名頗久，但從無一面之緣。過去曾看過有關他的資料很多，始終覺得他是謎一樣的人物。民國七十六年四月，看到某雜誌刊：「五十年前胡適的日記」一文，對於高宗武的記載，推崇備至。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到九月初這段時間，胡適與高宗武往來頻繁，關係好像十分密切。以胡適當時的聲望、學養以及年齡(高宗武當時恐怕只有三十歲多一點)，爲什麼會特別賞識高宗武？並且特

別向蔣中正委員長推薦？

現在將胡適二十六年七月、九月日記中有關

高宗武的片段記載，分別抄錄於後：

七月卅日：「到高宗武家吃午飯，在座的有蕭同茲、程滄波、裴復恒。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！

我們深談國事，決定了兩事：

(1) 外交路線不能斷絕，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。

(2) 時機甚迫切。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任此大任。

我打電話與布雷，勉他作社稷之臣，要努力做匡過補闕的事。」

七月卅一日：「早起的家電，只一個『安』字。

蔣先生約午飯。在座者有梅、伯苓、希聖、布雷、蔣夫人，極難談話。

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，可支持六個月。伯苓附和之。

我不便說話，只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：

『外交路線不可斷，外交事應尋宗武一談，此人能負責任，並有見識。』他說：『我知道他。我要找他談話』。

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，找宗武去長談。談後宗武來看我，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。宗武談甚詳。

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 miracle (奇蹟)，其難無比，雖未必能成，略盡心力而已。」

這兩天的日記，是在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，八一三滬戰發生以前。其中記載蔣汪找高宗武說話，內容並沒有說明，當然是最機密的，雖然是日記，亦不便記載。但胡適却說：「宗武談甚詳。」那就只有高胡兩人心中知道了。

八一三滬戰發生以後，九月初，胡適奉派赴美從事國民外交工作，不久且被任爲駐美大使。

九月七日日記中有一行記着：「晚上高宗武、程滄波爲我們餞行。」

九月八日日記中有一段如此記載：

「十點到鐵道部官舍，見汪精衛先生，他正在開國防會議，囑我小待。待至十一時半他才散會。談次，我勸他不要太性急，不要太悲觀。」

「十二點到高宗武家，只我們二人同飯，久談。我亦勸他不要太性急，不要太悲觀。我說，我們八月初做的『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』工作，是不錯的。但我們要承認，這一個月的打仗，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。這一個月的作戰，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，對內表示我們肯打，這就是大收穫。謀國不能不小心，但冒險也有其用處。」

這其中說到：「我們八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」，說的非常簡單含糊，不知到底做的是怎樣的「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」？這也是最大的機密，只有高宗武胡適二人知道了。據筆者的推測，大概不外就是所謂「對日謀和」的工作。不過滬戰發生以後，胡適赴美以前（胡適係於九月二十日離港飛美），他的觀點似乎又有了改變。不過我們僅就胡適七月廿日、七月卅一日、九月八日，這三天的日記看來，胡適與高宗武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，期許是甚深的，推崇是備至的。高宗武當時不過是外交部的一位中級官員（亞洲司司長），一位年輕的後輩，而能獲得胡適如此的讚譽，一定有他過人的長處與優點。

胡適出國不久，上海撤守，南京淪陷，國府遷都重慶。武漢成爲戰時的中心，實際上的臨時首都。高宗武仍然繼續他「對日謀和」的秘密工作，直到他脫離汪精衛和平陣營，赴港反正，悄然赴美隱退爲止。

胡適二十六年的日記，是我在五十年後的民國七十六年才讀到的。雖然其中只有三天記載與

高宗武的往來談話，但使我對高宗武却有了新的印象。可是仍然解不開我對「高宗武之謎」！高宗武在胡適出國以後再如何秘密進行「對日談和」？現在根據中日雙方的資料予以綜合敘述。

宗記洋行秘密外交

高宗武是日本留學生，畢業於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歷史系。二十三年返國，在南京向中央日報及外交評論投稿，發表有關中日外交問題的文章，引起各方對他的重視。當時，正在九一八事變以後，中日外交關係日趨緊張的時刻。汪精衛時任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，總務司司長爲李聖五，李係英國牛津大學畢業，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，兼東方雜誌的總編輯，頗富時譽。（李後來出任汪爲組織司法行政部部長）高宗武由於李聖五的介紹，出任外交部亞洲司科長。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遇刺受傷，不久赴法療養，辭去一切職務，由張羣接任外交部部長。此時我國外交工作，大部以日本爲主，所以給高宗武一個展現身手的好機會，不久即升任亞洲司司長。

張羣出任外交部部長後，由於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的關係漸趨破裂，日本駐華大使對於有關問題，乃直接向高宗武提出交涉，由於日本對高宗武的重視，亦使我國政府當局對高宗武也另眼相看。蔣委員長對他也優禮有加，一時成爲南京政壇鋒芒畢露的人物。

在抗戰發生的前兩年，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

右派西義顯擔任南京辦事處主任。那時東北早已淪陷多時，南滿鐵路實無在南京設立辦事處的必要，政府竟亦默許其存在，其中實有微妙的訊息。

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右，其後出任日本外相，於民國三十年四月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，此爲日本積極實行南進政策，偷襲珍珠港之準備。日本投降後盟軍遠東軍事法庭將其列入甲級戰犯二十八名之內，在審判中病死東京巢鴨監獄。

戰前中國銀行南京分行經理吳震修，他是黃郭的同學。吳震修與日人西義顯同住南京江蘇路，因係近鄰的關係，過從甚密，不時交換中日問題的意見。

七七事變爆發以後，高宗武乃約吳震修、西義顯會商，如何避免戰事擴大，以免中日同歸於盡。三人決定由西義顯即返大連，向松岡洋右進言。西義顯到了大連以後，詳細報告南京的實際情況，並對中日情況詳爲分析，終於說服了松岡。松岡乃寫了一封信給近衛首相，命西義顯返日面呈。可是當西義顯到了東京，上海的戰事却已爆發，局勢急速轉變，軍人氣餒高漲，連近衛也無能爲力了。其後雖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，但最後仍然失敗。

三度謀和所爲何來

這是不是胡適在日記中所說的：「我們八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」呢？

(一) 武宗高物人襟襟

民國二十六年年底，南京淪陷。政府重心遷至武漢。當時中日雖已無正式外交可言，但高宗武仍在秘密的進行與日本的溝通。高宗武在香港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所，對外則以「宗記洋行」出面，與日本駐港的外交特務人員以及同盟社駐港的松本保持經常的聯絡。這是出於國民政府的授意，抑是高宗武的個人行動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這時國民政府正在進行聯俄的工作，蘇俄的軍事顧問、飛行員以及飛機、戰車等武器，不斷經由新疆運到武漢，南京首都雖然淪陷，但民心士氣至為高昂。

高宗武經過第一次的失敗，對日謀和仍然沒有死心。乃於二十七年一月，派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秘密由港赴滬，訪問留滬的西義顯。兩人會面以後，立即探討中日和平的問題。最後決定兩人同赴東京進行。但是當他們到了東京不久，亦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失敗的時候，日本政府突然發表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」的聲明。結果高宗武再度嚐到失敗的滋味。

董道寧在東京時，由西義顯的介紹，得以會見時任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影佐禎昭（第八課專辦對華問題。影佐後來出任汪偽組織最高軍事顧問，太平洋戰爭時，調赴南洋出任師團長）。影佐曾寫了一封親筆信託董道寧帶交政府中某兩位高級人士。董道寧返滬口後，即將此函親交周佛海，請周佛海再為轉交。故周佛海對於與日談和的內幕知之甚詳，且極同情。在南京時，西流灣的周宅，曾有「低調俱樂部」之稱。周佛海後來隨汪精衛赴滬與日談和，再赴南京「遷都」

，成為汪偽組織汪精衛以外權力最大的要角。

民國二十七年春，高宗武在漢口久等董道寧不同（董由滬赴日，又由日轉往大連，以致稽延時日），乃自漢飛港，再由港乘輪直達上海，與日本同盟社上海支局長松本密談和平條件。松本不但為同盟社上海支局長，且為日本近衛首相駐華的私人代表。高宗武與松本商談後即返香港。松本當將與高宗武商談詳情轉呈近衛首相後，亦赴香港與高宗武等繼續商談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高宗武、董道寧、西義顯、松本重治與伊藤芳男等五人，相約在香港淺水灣酒店進一步討論和平問題。初步決定先行停戰，再行談商細節。

西義顯於四月二十七日返抵東京，在參謀次長室將高宗武的和平條件提出（關於東北及內蒙問題，留俟他日再談，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，長城以南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之完整，日方應予尊重）。此時正值徐州會戰已達決定時刻，更使日本的軍人狂妄，對於和談極為不利。日本近衛首相且公開強硬表示，不與中國國民政府妥協。高宗武第三次的與日謀和又告失敗，使高宗武處於最狼狽的境地。

高宗武對日謀和三次都失敗，其原因雖不在其本身之能力，實因日本軍人態度太過囂張，但事實上，確是徹底的失敗。高宗武經過詳細檢討以後，認為日本既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」，那麼，就不如抬出國民政府的次號人物——汪精衛，作為和談的領袖，或有成功的希望。高宗武對於中日和平似乎特別感到興趣，他雖經過三

次的失敗，仍絲毫不氣餒，再接再厲，不知所為何來？

調整方針騙局陷阱

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五日，高宗武由香港乘日本皇后號輪到了日本神戶，與日方再謀和談。由影佐引見板垣陸相及近衛首相，高宗武乃提出以汪精衛為交涉和平的對象，並要求近衛寫一親筆信給汪精衛，表示日本的誠意，盼望汪精衛能出面領導和平運動。最後由板垣陸相代近衛首相寫了這封信。

高宗武獲得日本板垣陸相代近衛首相親筆所寫的保證函後，即由日赴港，與其溫州同鄉梅思平商討（梅曾任江蘇十區行政專員，兼江寧實驗縣縣長，當時任中宣部駐港特派員，在蔚藍書局主編國際叢書，同為「低調俱樂部」同志），決定由梅思平攜板垣函飛渝，與周佛海共同見汪精衛。汪看到板垣函後，即決定出面領導和平運動，並決定派梅思平為正式代表，高宗武為副，赴滬與日方代表繼續商談。

梅思平返港後，即積極草擬和平方案。十一月三日，日近衛首相發表了「善鄰友好，共同防共，經濟提攜」三原則。

梅思平、高宗武二人於十一月初由港赴滬，與日方的代表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（是日本陸軍中的「中國通」。日本投降時，他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，曾代表總司令岡村寧次，前往芷江中國陸軍總司令部，接受日本投降後中國第一號命令）及伊藤芳男二人在上海虹

口重光堂開始談判。中國方面則以梅思平為首席代表，高宗武為副，周隆庠任翻譯。初步談判後，今井向參謀本部報告，由日方作成對案，名為「中國關係調整方針」。十一月十九日，影佐與犬養健（日本前首相犬養毅之子，當時他是日本眾議員，遞信省（交通部）參與官。為近衛首相智囊團之一人。戰後出任吉田茂內閣之司法大臣）飛抵上海，又與梅高二人繼續商談，就雙方同意各點，先行簽字。從此汪精衛所領導的和平運動，就開始展開了。

汪精衛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逃離重慶，經昆明而到越南河內。日本近衛首相於二十二日發表聲明，但並未照上海重光堂雙方協定的原案（原案為日本在兩年內由長城內撤兵），對於撤兵一字未提，反而說：

「為保證防共之目的，在防共協定繼續期間，日本將在華北及內蒙地區，駐屯相當數目之軍隊」，並要求日本臣民之特別權利。因為汪精衛既已逃出重慶，近衛聲明乃將「撤兵」改為「駐兵」，這明明是一種騙局，而汪精衛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所謂「豔電」以響應之。

近衛聲明一大謊言

犬養健在其所著「長江還在流着」中曾說：當他同影佐兩人於近衛聲明發表後，同走出首相官邸途中，影佐自言自語說：

「扯謊為萬事之開始麼？」由此可見連日本人亦自承近衛聲明是謊言，對於和平騙局的前途，不抱樂觀了。

汪精衛在河內發表「豔電」後，日本即派影佐、犬養二人赴越與汪精衛連絡。可是當他倆在臺灣途中，却得到近衛內閣辭職的消息，所以又折返東京。因此使汪精衛陷入困難之境，而高宗武更感困難。參加和平運動的份子如周佛海、梅思平等對高宗武對日認識錯誤，紛加嚴厲的批評，使高宗武倍感痛苦。感覺「高宗武路線」有消滅之勢。

據西義顯在其所著「悲劇之證人」中說，所謂「高宗武路線」，依二十七年六月十四日，在九龍廣東酒店，日本方面同志與高宗武一致的見解是扶植汪精衛之第三勢力，使主張和平大義，隨大勢所趨，再斡旋蔣汪兩者，導致對日全面和平。

西義顯是日本陸軍大將前教育總監西義一的胞弟，早稻田大學畢業。性格剛強，不與世俗妥協。他是最早參加中日和平談判的日本人。

西義顯反對汪精衛在日閥的勢力下組織偽政府，後來高宗武脫離汪精衛陣營，西義顯亦未參加南京偽組織，另圖設法與重慶直接談判，打破中日僵局。結果因為一日之差，未能成功。

一頁和平工作秘史

日本投降後，西義顯失業，貧病交迫，乃抱病寫成「悲劇之證人」又名「日華和平工作秘史」。因其人之性格，又為首先參加和平工作之人，所以他的著作內容極為可信。

高宗武為挽救「高宗武路線」之滅亡，決定採取非常措施。於日本政變之後，由港赴河內訪

汪，與之討論今後方針。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重返港。

高宗武之非常措施，在使汪精衛保持一中立地帶。這地帶為南寧、欽州、雷州半島一帶。為使龍雲、張發奎能採取行動，並防止國民政府中央軍之攻勢，要求日軍發動牽制作戰。即日軍攻佔南寧以北地區，使中央軍無法通過，以掩護張發奎軍，使得成為擁護汪精衛之中立地帶。這不是高宗武的幻想。即使能够保持一中立地帶，龍雲、張發奎等軍人，會擁護汪精衛嗎？他不明也，彼一時也。

西義顯在他的書中說：「我原諒高宗武之心境，一月下旬致影佐一長函，託高橋書記生攜回東京，使影佐先悉內容，無條件支持高宗武之要求，向作戰當局先容。」

周佛海路線被採用

二月四日，高宗武、周隆庠、伊藤芳男三人，由港乘賀茂丸直達長崎，再乘福岡轉往東京。高宗武的要求，經影佐代向參謀本部作戰當局進行，被他們以統帥權獨立的理由，完全加以拒絕，高只有於二月底返回香港了。所謂「高宗武路線」，從此真的滅亡，代之而起的，是所謂「周佛海路線」。

汪精衛在重慶時，對於和戰問題，曾與他的左右二員大將陳公博、顧孟餘商討，陳顧二人均堅決反對和平，反而中央系的周佛海、梅思平等却極力主張和平。傳說周佛海這時在蔣委員長面

前已失寵，又說他有數十萬之鉅款，存於上海日本正金銀行，怕被日人沒收。梅思平正在窮愁潦倒之時，在香港蔚藍書局當一名編輯。而汪精衛由於領袖慾太強，這時却是國民黨的副總裁，毫無實權，由於與蔣中正的意氣之爭，加以對於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，乃衝動的憤而離渝，飛往河內，發表「豔電」，響應近衛聲明，中了日人的毒計。

同時，汪精衛的主和派份子都患有極深的「恐共病」。抗戰開始以後，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，擁護抗日，政府收編共軍為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，共同抗日。孰知中共是接受第三國際的密令，亦是一種騙局，乘此抗日機會，擴充實力，以作奪取政權之準備。

汪精衛早在北伐時代，在武漢就上了中共的大當；而不得不上中共的道路。戰時在武漢，他擔任參政會議長，就備受中共參政員王明（陳紹禹）等人的辱罵。至於周佛海、陳公博二人更是中共的發起人，是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二位代表之一，後來都脫黨了。他們對於中共的策略與作爲，當然是十分熟悉的。他們大都認爲中日如果長期戰爭下去，不但兩敗俱傷，而且使蘇俄與中共坐收漁人之利。這種認識雖然不錯，但是要到日本佔領區去成立偽組織，從事和平運動，這就走上斜道了。

多重間諜粉墨登場

雖然汪精衛等主和派的主幹，都患有極深的「恐共病」，但在後來的偽組織中，却潛伏着中

共的地下份子，這恐怕是他們夢想不到的。在敵僞佔領的淪陷區，中共就派有兩個頭頭，一明一暗的在從事地下活動。明的頭頭就是袁殊，他擔任僞江蘇省政府教育廳長，上海「新中國報」社長。湖北人，日本留學生。抗戰前幾年回國，在上海爲日本總領事館作情報工作，同時又爲中共工作。戰前被捕反正後，又爲中統、軍統工作，是一個多重的間諜。

戰時京滬淪陷後，袁殊在上海被七十六號僞特工總部逮捕，後爲日本人保釋。因此，袁殊又與李士羣發生了關係。

戰時日本最反動的機構是興亞院。袁殊曾爲這個機構在上海大搞其所謂「興亞建國運動」。周佛海爲打消此一運動，曾出鉅資由袁殊辦一「新中國報」，作爲交換條件。因此「新中國報」成爲了中共在淪陷區公開的秘密陣營。

「新中國報」創刊封面是日皇裕仁的照片，而且寫着「天皇陛下」四字，令人噁心之至！袁殊其貌雖不揚，但是在淪陷區却能呼風喚雨，風流韻事特多。影星英茵就是爲了要救她的愛人而受袁殊之騙，在上海跳樓自殺，轟動一時。

袁殊既是共產黨，爲什麼能在淪陷區公開活動，與李士羣狼狽爲奸？這完全是由於日本各方面支持。後來又故作擁周（佛海）狀，獲得周佛海的支持。「新中國報」的董事長，就由周佛海擔任。

袁殊在中共的地位，當然不及潘漢年。潘漢年在戰前即任第三國際的代表，長住上海。曾代表第三國際及中共與政府代表張沖秘密談判國共

合作問題。戰時又爲上海方面的負責人。袁殊是受他的指揮。潘漢年住在蘇州僞江蘇省政府主席僞清鄉委員會秘書長、僞警政部部长李士羣的家中，是最安全的了。潘漢年是在淪陷區暗中活動的中共頭頭。

李士羣是留俄學生，返國後從事中共地下工作，曾被捕多次，最後反正爲中統工作。戰時因犯了嚴重錯誤，逃奔香港至滬，最初爲日本特務土肥原做情報工作。汪精衛到滬後，即與丁默村共同主持上海七十六號僞特工總部。後來李士羣擁周（佛海）倒了，成爲七十六號唯一負責人。再倒周拍汪，成爲僞組織僅次於周佛海的實力人物。他的野心無限，復又接受潘漢年的策反，投入中共的懷抱，曾赴江北揚州與新四軍政委劉少奇秘密晤談，準備在京滬沿線，江南一帶保持並擴大實力，以便於日軍敗降時，響應中共，佔領京滬。他們這一陰謀，爲周佛海偵悉，周佛海乃令其部下羅君強（僞安徽省長）、熊劍東（僞財政部稅警總團副團長）與日本憲兵合作，將其毒斃，才消除了心腹之患。

統戰功臣變成叛徒

大陸淪陷後，潘漢年出任上海僞市政府副市長，民國四十四年四月，在北平秘密被捕，罪名爲叛徒、內奸、特務、及反革命份子等等。最後判處無期徒刑，永遠開除黨籍。民國六十六年病逝長沙。民國七十一年獲得平反。中共統戰的大功臣，結果竟然變成叛徒、內奸、特務及反革命份子！他自被秘密逮捕以至病死，前後長達二十二年

之久，可謂慘矣。這就是中共統戰功臣的下場！袁殊在勝利後，逃往江北新四軍，在文革期中，未見受到鬥爭。由此亦可見袁殊翻雲覆雨的能耐。重慶國民黨中央，在汪精衛離渝逃到河內發表「豔電」後，乃開除其黨籍。同時，又派中央委員谷正鼎前往河內，勸其赴歐美各國遊歷，並將各國領事業已簽證的護照帶去交汪精衛，可是遭汪精衛的拒絕。

谷正鼎離開河內的第二天夜裏（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），軍統局派員潛往河內高朗街汪精衛的寓所，本欲刺殺汪精衛，結果誤將汪之親信曾仲鳴打死。日本政府於汪精衛被刺的第二天，乃開五相會議，派影佐、犬養等乘貨船北光丸前往河內迎汪精衛赴滬，從此汪精衛成爲了日本軍閥的俘虜。據日本原田熊雄著「西園寺公與政局」（英譯本又名「原田文書」。原田熊雄男爵係西園寺公爵的秘書）載：

「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午後六時，赴萩窪近衛家閒談，問及漢口攻佔後之方針，近衛稱：在五相會議決定，漢口攻佔後，若蔣政權仍繼續存在，當用『謀略』而使之崩潰。」

所謂「當用『謀略』而使之崩潰」，當即係利用汪以倒蔣。這是日本內閣以及日本軍閥的幻想，判斷錯誤，根本不了解中國當時之實際情況。蔣並未因汪之出走而崩潰，反而更獲得全國各界之擁戴，而在汪精衛領導之和平運動，僅有極少數之投機份子參加。對於抗戰之進行，絲毫發生不了作用。近衛及日閥，對於汪精衛實犯了「估計過高」的錯誤。而汪精衛亦犯了「與虎謀皮」

的幻覺，終至走上斜道而成爲日閥的俘虜。這都是由於高宗武穿針引線，輕舉妄動，一心想包辦中日和談，建立不世的奇功而以致之。使得中日和談不能依正道進行，而使戰爭持續下去。

宇垣會孔胎死腹中

犬養會對高宗武說：「和平運動若變成反蔣運動，則將喪失一切了。」

如果犬養早對高宗武提出這樣的警告，高宗武也許不致向日方提出以汪精衛爲和平運動中心，而被日方利用，作爲「謀略」，以致產生嚴重的後遺症。另一方面，他又爲周佛海、梅思平等製造組織「選都」的機會，以汪精衛的招牌，開拓一個新的局面，以遂他們的政治野心。

高宗武雖然誠心求和，但因求和心切，以致鑄成大錯。他並無投降敵人作漢奸的意圖。他曾對犬養說：「我決不做漢奸。我的和平運動界限極爲明顯，即做漢奸與不做漢奸之分。若不做漢奸之和平工作，雖極困難，我亦不辭。若要作漢奸，我就撒手，雖中途逃脫，被人目爲反叛亦所不辭。因你是可靠的人，故先申明。對於松本我也說了多次。」

最後高宗武終於走上不做漢奸的脫逃之路。這樣雖保全了自己，却爲國家帶來無窮的災禍。

近衛第二次組閣時之外相爲宇垣一成。宇垣就職時，張羣曾有一電致賀。因此引起宇垣謀和之計畫。宇垣提議以當時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經手較爲便利可靠。孔祥熙乃派其秘書喬輔三爲代表，日本則派駐香港總領事村中豐一爲代表，於二

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夜，在香港中村官舍進行談判。所有主要條件，彼此都有相當諒解。決定由孔祥熙赴長崎，與宇垣作最後之談判。宇垣乃向閣議報告，要求政府授以全權，海相米內亦願派一巡洋艦接孔祥熙赴長崎。不料此一消息竟由閣員洩漏，日本軍閥認爲既然汪精衛願出來領導和平運動，可以「謀略」使蔣崩潰，不須再與蔣交涉，極力加以反對。近衛受了軍閥的影響，亦不再支持宇垣，宇垣祇有辭職的一途了。這次宇垣與孔祥熙的謀和，如果不是受了高宗武的影響，很有成功的可能，那以後的歷史，就該重寫了。

根據西義顯、犬養健、原田熊雄等人的著作，證實當時的日本，無論是內閣或是軍閥都確實的希望和平停戰，不希望中日戰爭再繼續打下去。最初由英德等第三國使節調停不成，後由高宗武三次努力亦未成功，最後高宗武乃提出以汪爲和平運動中心的條件而獲日方同意。可是這是一條斜道，不但不能解決中日和戰問題，反而使問題僵持下去，戰爭持續下去。在中國方面，雖獲得最後的勝利；但却使蘇俄卵翼下的中共坐大，實行全面武裝叛亂，以致大陸失陷；而日本方面，則爲無條件投降。

當時我國政府方面，縱或與日本真能謀和，停止抗戰，亦勢必引起內戰。中共一定會首先反對，不惜以武裝叛亂來反對，大陸可能早於三十八年前就失陷了。因爲中共早在抗戰初起之時，即高喊打倒「投降派」、「反共就是投降派」、「談和就是漢奸」。好像祇有中共才是抗日的英雄。（未完待續）